

戎夏探源与语言历史文化研究

周及徐 / 著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周及徐 / 著

戎夏探源与语言历史文化研究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戎夏探源与语言历史文化研究/周及徐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7-100-10878-2

I. ①戎… II. ①周… III. ①语言学史—研究
IV. ①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590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戎夏探源与语言历史文化研究

周及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878-2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2 1/4

定价:49.00 元

自序

周及徐

这本书以我从2004年到现在撰写的学术论文编辑而成。其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一、远古时期黄河流域的语言文化与外来语言文化的交流；二、四川方言研究；三、古代文化与语言；四、英文论文3篇。这些文章大部分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

第一部分是我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2002)一书研究的继续。12年前，当我发表这部专著之时，信心满满，以为可以掀起一个大讨论，把汉语与印欧语、华夏民族与印欧民族的历史渊源穷追到底，有辉煌的发现。可不仅没有“振臂一呼天下云集”，被沉默冷落之外，更有朋友转告背后的讥议以至恶评。这才体会了学术的艰难不只在十年寒窗的勤苦，还要禁得住十年冷落的孤独。然而，我不后悔，真诚的学术追求值得付出。一些往事至今难忘：北京师范大学王宁先生为首的诸位先生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此前素昧平生的伍铁平先生把我叫到他家，把珍藏多年的资料借给我，鼓励我坚持这个大有可为的语言研究方向；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教授邀我去宾大讲学，支持我继续研究。长辈、同行以至学生给我的鼓励增添了我的信心。我陆续写出黄河文明探源的6篇系列文章（其中3篇英文），主要讨论华夏民族的起源问题，以语言学证据为基础，认为西方及中亚地区的印欧民族对华夏民族的初期形成有重要影响。

其中第一篇，《华夏古“帝”考》一文，讨论上古文献中华夏之“帝”及祭祀与印欧古代文明对天帝信仰的诸多相似之处，历史语言学的证据又

证明上古汉语的 *tees (帝) 与原始印欧语的 *Deus (天帝) 同源。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黄河流域史前文明和印欧史前文明的联系。这是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Center of East Asian Studies, UPenn) 访学时写成的, 原文发表在梅维恒教授主编的 *Sino-Platonic Papers* 上, 回国后改写成中文, 这里将英文原文收录在本书的第四部分。

第二篇《戎夏同源说》原也是英文, 发表在 *SPP* 上, 原标题为《农业文明在中国的兴起: 考古发现与历史记载的差异及其解释》, 后来改写为中文。从上古文献和词源的证据看, 上古“戎”与“夏”的生活方式不同: 戎为游牧, 夏为农耕; 戎与夏商周人是共同的祖先的后裔。自夏商至西周, 中原人完成了从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变, 进入到农业文明时期, 由戎成为夏。此文最后的语言学证据提出, “戎”一词是西来的。此文改写为中文发表时进行了删改和补充, 故文题也改了。此文的英文原文同样收在本书的第四部分。

第三篇文章是《老子和孔子: 不同的社会基础及其文化》。此文的核心论点是: 孔子和老子思想之间的分歧和对立, 并非凭空产生, 而是各自有其不同的社会基础的。这种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被人们忽略了。观察儒道对立的若干现象, 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背后的不同的社会基础或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还可与当代人类学关于人类早期社会的研究相印证。这与文化接触和交流的关系何在? 孔子思想的社会基础 (即等级制社会) 与外来文明相联系, 老子思想的社会基础 (即无等级制的土著社会) 与本土文化相联系。这里没有用语言学证据, 而是从古代文献记载反映的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来看, 主题与前两篇文章相通。本文已由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的周岷老师译为英文, 发表在美国宾大的 *SPP* 上。英文译文亦收在本书第四部分。

这一部分的另外 3 篇是关于语言历史的比较文章。以上古汉语音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对古汉语与原始印欧语的共同词汇进行了比较和讨论, 认为两大语系语言存在的共同词汇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两大民族在史前时期交流的结果。这些研究是我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的继续。

第四篇《汉藏缅语与印欧语的对应关系词及其意义》一文，列出 11 组汉语、藏语、缅语和印欧语互相对应的词汇。这些对应词不仅是汉藏语与印欧语历史关系的证据，同时还提示：汉藏语和印欧语密切关系的时间应在汉、藏、缅语分裂形成独立的语言之前。

第五篇《上古汉语中的印欧语词汇》，列出上古汉语与印欧语的对应词汇的部分基本词、代词和同音词。这些词汇是在我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中选出的。这里以每组含有相同声符的词说明同音词在汉语和印欧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为同声符的同音词构拟不同词形的根据，这是利用汉语内部材料和外部材料构拟上古汉语词族的一个方法。

第六篇《韩语与上古汉语对应词举例》，提出“熊、马、虎、蛇”四个词，以说明两种语言在上古时期的联系。韩语汉字词与中古汉语的对应关系是普遍的，韩语词与上古汉语对应的词常被看作是韩语固有词，对应关系不是那样明显，要经过仔细的考察才能发现。中国与朝鲜交往的历史早于公元前 11 世纪，汉语和韩语存在上古时期的共有词是与历史相符合的。

关于汉语和印欧语的关系的研究还只是开端，还有很多事要做。我自己也计划要把“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重新修改或重写，但一直没有实现。这事只有等待将来了。

第二部分，关于四川方言研究的 8 篇文章，是我近 7 年来研究四川方言的成果。研究汉语和印欧语关系同意的人少，支持的人更少，研究现代汉语方言也不失为语言学研究的选择。在学习和研究中越来越深刻体会到，方言研究是语言学基本功（包括理论和技能）的必要的修炼。方言研究看起来与语言历史学相差很远，实则有着深层的联系，特别是对汉语这样有着纷繁的方言分歧，“就像一个语系的语言”。汉语方言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好材料，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就是以汉语方言为基础写成了《中国音韵学研究》（1926）——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史开山之作。研究汉语史应该从研究汉语方言做起，方言的大量材料是语言真实的血肉，指引我们去分析语言的历史变化。有了方言研究的学术积累，语言历

史比较能做得更扎实、更有底气。我是成都人，当然从自己熟悉的家乡方言做起。从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于四川方言的研究，后来又申请到了四川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在这些课题的支持下，在大量方言调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现，我们提出了四川方言分布和历史形成的新的观点和论证。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我从2004年到现在的语言学研究生们，他们与我合作做了大量的方言调查，10年中积累了四川方言研究的丰富资料，我们也收获了方言研究实践的经验。我的《四川西南地区方言研究》正在整理中，下面的文章是与之相关的一些研究。

第一篇文章《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提出了四川方言中两大不同历史层次的板块“湖广话”和“南路话”。以前的研究认为，现代四川方言都是元明清以来的湖广移民带来的。根据对移民史材料、四川方言分布状况的分析，我们认为现代四川方言大致以岷江为界，以东以北地区是明清移民带来的“湖广话”方言，以西以南地区的“南路话”则是当地宋元方言的存留。以前的研究中，对“南路话”的忽视，将其混同于四川官话“湖广话”，导致了四川方言历史形成结论上的偏误。这篇文章主要是从移民史和方言地理分布上来论证的。

第二篇文章《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是上一篇文章的姊妹篇。文章列举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特点，说明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差别是以汉语中古音系为条件的，两种方言音系之间并不互相包容。我们还选取了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特点作了音系相似度的比较，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分析南路话的语音特征与湖广话对应关系，更证明南路话不是湖广话演变的结果。结论是：南路话应是元末以前四川本地汉语方言在当地的后裔。与上一篇文章得出的结论相同，但论证的方法和材料不同，是以方言音系特点互相比较来论证。这个结果也证明了历史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语言或方言在空间上的差异，反映的是它们的历史距离。

第三篇文章《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湖广话”的来源》是从语音特征来考察现代四川重庆地区通用语“湖广话”（即成渝话）的来源。根据移民史资料，明清四川移民的主要来源地是湖北“麻城”，我们用现代方言

的语音特征来检证，麻城话与成渝话的语音相似度很小。现代方言语音特征的证据否定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主要来源于“麻城孝感”地区的说法。方言语音特征的证据显示，今成渝地区的操“湖广话”的人群主要来自三峡东部地区和相邻的江汉平原地区，是明清湖广移民的后裔。这是清理湖广话发展的线索。

第四篇文章《四川青衣江下游地区方言及其历史形成》讨论四川省南部青衣江下游地区彭山、眉山、丹棱、洪雅、夹江等地区方言。这些方言在语音上与广泛分布于川西南的四川南路话不同。考察二者的语音特征，它们在音韵结构上是一致的。该文以方言音系特征为证据，说明青衣江下游地区方言与南路话之间的语音差异是近代音变形成的。青衣江下游方言是南路话在川南地区的地域分支。这是清理南路话在四川发展的线索。

第五篇文章《四川雅安地区方言的历史形成及其与地理和移民的关系》讨论雅安方言的来源。四川雅安地区方言因具有“入归阴平”的语音特征，在四川方言的分区上是被划为一个独立的“雅棉小片”。从表面看来它与四川地区的湖广话（入归阳平）和南路话（入声独立）都不同。与周围方言语音特点比较，分析其语言历史演变过程，雅安地区方言应是四川宋元以来的土著方言南路话的分支。雅安地区的历史地理通道和明清移民史可以解释其不同的历史层次。

第六篇文章《四川自贡、西昌话的平翘舌声母分布》讨论自贡、西昌话卷舌声母特征的来源。四川的官话方言里，自贡地区和西昌地区有平、翘舌声母之分，但分布的规律与其他方言有不同。研究平翘舌声母在某种方言音系中的特殊分布，有助于了解该方言在语音历史发展中的演变关系。结论是：四川自贡、西昌等地的平翘舌声母在音系中的分布有很强的一致性，且在汉语方言中自成一类，与“南京型”接近而又有不同。从古音的发展看属于知章合一、庄组独立的一派。

第七篇《〈广韵〉等韵书中的成都话本字》（之一），列举了22例成都话口语词，并分析了它们与《广韵》等韵书中的相应字词的音义关联，以

证明它们的源流关系。这是传统的“方言考本字”的做法，只不过考的是我自己的方言成都话的本字。

第八篇《〈广韵〉等韵书中的成都话本字》(之二)，收集了成都话中46个与“声符读音”相关的汉字，以《广韵》音、普通话音和成都话音相比较，分析它们的语音演变现象和规律。这说明依声符音来认读汉字的现象，在方言中存在，在普通话中也存在；在今天存在，在古代也存在。

第三部分，关于古代文化和其他内容的六篇文章，大部分是揭示古代文化现象中的被掩盖的事实，提出我的新见。

第一篇《“炎帝神农”说辨伪》是关于炎帝不是神农的考证。“炎帝神农”说以炎帝神农为一人，从2000多年前流传至今，仔细地考察却没有确实的根据。司马迁《史记》无此说，查检先秦汉初的20余部文献，言神农或言炎帝50余处，神农与炎帝皆不相混，二者的时代特征、重大的行为和事件皆判然有别。于是得出结论，神农和炎帝为先后不同时代之人。把炎帝和神农嫁接在一起的是汉代刘歆，其《世经》以上古帝王世次附会五行说，捏造了“炎帝神农氏”。

第二篇《上古时期的“龙”》讨论“龙”的来源，时间限定在上古时期。从上古文献考察，上古至春秋时期“龙”是黄河流域的一种真实动物。龙在生活中常见且能驯养，古人因其习性将其与求雨相联系。春秋时期自然环境变迁，“龙”在中原日渐稀少以至绝迹，秦汉以后神圣化，成为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春秋以后800年，中原人于长江流域再见到这种野生动物时，不知其为上古之“龙”，而以当地土著人之语称之为“鳄”。

第三篇《弃稷解》是对《诗经·大雅·生民》的新的解读。《诗经·大雅·生民》中后稷出生的神话，实际是上古华夏族弃婴习俗的曲折反映。该文从古文献、汉字学、人类学和语源探索的角度进行论证。

第四篇《〈红楼梦〉“护官符”新解》是试解《红楼梦》中的一个谜语。《红楼梦》留下许多未解之谜，“护官符”是其一。解开这些谜是真正领悟《红楼梦》原著的重要关节。该文结合小说原文、脂批和相关史料试而解之。一共四句，自认为第一句解得不错，第三句解得勉强，第二、四

句解得对不对，请读者判断。

第五篇《〈汉书·扬雄传〉及颜注“京师谚语”校误》是一篇小文，指出传世本《汉书·扬雄传》京师谚语“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其文意与前后文不符，以《文选》注、《太平御览》等文献相校，见其错误。

第六篇是我为老师杜道生先生的著作《论语新注新译》一书所写的前言。杜先生在四川师范大学执教 50 多年，2013 年以百岁高龄去世。杜先生是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的老师。我后来在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从教，亦时时向杜老请益。杜先生是影响我最久最深的老师，所以将此篇文章收在这里。

第四部分是附录，包括英文文章 3 篇，是第一部分“黄河文明探源”系列文章的英文，原发表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术刊物 *Sino-Platonic Papers*。

以上各篇文章涉及语言、历史和文化，论题各不相同。如果要归纳出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新”，都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得出新的结论，与前人不同。当然，我相信它们是接近真实的。“只因为它是真实的，就要人们相信它，这是不够的。假如它们与其他信仰和观点不一致，也就是说，假如它们与其他大量集体表现不协调，它们就要受到人们的否定；心灵会将它们拒之门外，就像它们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① 连科学也得依赖舆论，更何况这些絮絮叨叨的讨论。所以如果这些东西被当作“没有存在过一样”，也是合于世情的；它们的被接受和赞同，倒是意外和奢望了。

我是教师，以教书谋生，学术研究是教学之外的兴趣。虽说是自幼便受教要勤勉努力，光阴还是虚度了。十年是不短的时间，其间专注用功、激情迸发的时候，积淀成了这本小书。如果有读者赏光，欢迎批评赐教。

① [法]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603 页，商务印书馆，2013 年。

目 录

华夏古“帝”考

- 黄河文明探源之一 1

戎夏同源说

- 黄河文明探源之二 21

孔子和老子：不同的社会基础及其文化

- 黄河文明探源之三 37

汉藏缅语与印欧语的对应关系词及其意义 48

上古汉语中的印欧语词汇

- 史前时期语言混合的证据 57

韩语与上古汉语对应词举例 67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

- 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 73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

- 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89

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湖广话的来源

- 成渝方言与湖北官话代表点音系特点比较 112

四川青衣江下游地区方言语音特征及其历史形成 132

四川雅安地区方言的历史形成及其与地理和移民的关系 152

四川自贡、西昌话的平翘舌声母分布 166

《广韵》等韵书中的成都话本字（一） 176

《广韵》等韵书中的成都话本字(二)

——受声符影响而读音发生变化的字..... 182

“炎帝神农”说辨伪..... 190

上古时期的“龙”..... 204

弃稷解

——探寻《大雅·生民》中的史前民俗..... 213

《红楼梦》“护官符”新解..... 220

《汉书·扬雄传》及颜注“京师谚语”校误..... 228

杜道生先生《论语新注新译》前言..... 231

附录

Old Chinese “帝 *tees” and Proto-Indo-European “*deus”:

Similarity in Religious Ideas and a Common Source in Linguistics 238

The Ris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Disparity

between Archeological Discovery and the Documentary Record

and Its Explanation 264

Confucius and Lao Zi: Their Differing Social Foundations and Cultures 320

参考文献..... 336

CONTENTS

Part I Looking for National Sources of Rong and Huaxia

Old Chinese “帝 *tees” and Proto-Indo-European “*deu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Volume I 1

The Common National Source Shared by the Rong and the Huaxia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Volume II 21

Confucius and Lao Zi: Their Differing Social Foundations and Culture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Volume III 37

The Correspondent Words between Chinese, Tibetan, Myanmar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nd their Posi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48

The Proto-Indo-European Words in Old Chinese: the Evidence of Linguistic

Creolization in Prehistoric Period 57

Examples of Correspondent Words Between Korean and Old Chinese 67

Part II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in Sichuan

New Thesis on Immigrating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Evolving of the

Sichuan Dialects 73

Phonetic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ANLU

(南路) Speech and HUGUANG (湖广) Speech in Sichuan

Province 89

Looking for the Origin of the HUGUANG Speech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from the Phonologic Features 112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ialects in Lower Reaches of Qingyi River

in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132

Formation History of Dialects in Ya'an Distric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y and Immigration 152

Distribution of Alveolar and Retroflex in Affricate-initials in Sichuan Dialects	166
Chengdu Dialect Words Recorded in <i>Guangyun</i> (广韵), Part I	176
Chengdu Dialect Words Recorded in <i>Guangyun</i> (广韵), Part II	182
Part III Ancient Culture Study	
Distinguishing Fake Statement “Yandi-Shennong”	190
“Long”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Texts before 500 BC	204
Original Mea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 Qi (弃): An Exploration of the Prehistoric Folk Custom in a Remote Ode	213
A New Answer to a Riddle in <i>Dream of Red Mansions</i>	220
A Faulty Revision and its Annotation in Biography of Yangxiong of <i>Hanshu</i> (Book of Han)	228
Last Confucian—In Memory of My Teacher Du Daosheng	231
Part IV Looking for Sourc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in English)	
Old Chinese “帝 *tees” and Proto-Indo-European “*deus”	238
The Rise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Disparity Between Archeological Discovery and the Documentary Record and Its Explanation	264
Confucius and Lao Zi: Their Differing Social Foundations and Cultures	320
References	336

华夏古“帝”考[▲]

——黄河文明探源之一

阅读提要：“帝”是华夏先民的最高天神，夏商周秦人皆崇祀之。上古文献反映古华夏的“帝”以及对其的祭祀与印欧古代文明对天帝的信仰和崇拜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语言学的证据又证明上古汉语的“帝 *tees”与原始印欧语的“*Deus（天帝）”同源。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黄河流域史前文明和印欧史前文明的联系。

一

“帝”是夏商周及后来中原诸侯国共祀的天神，是天地间的最高主宰，古称其为“帝”或“上帝”，又称“天”。《说文解字》：“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东汉的大古文家许慎怕是为世俗之说所扰，已不明“帝”的本义。清代的后生朱骏声有见地，一针见血地指出：“帝本训上天也。”（《说文通训定声》）上古文献中，“帝”、“上帝”、“天”、“天帝”常常互用而同义，指主宰自然和人类的最高神。上古“帝”指天神而非人君，这在上古文献中很明确，学者大多无异议。然而由于上古先民把自己崇拜的先祖也冠以帝号，例如黄帝、炎帝、帝瑞珥、帝喾、帝尧、帝舜之类，使得后来的人们常常把上帝与人君相混。人与神，这是一个大的分界，必须要辨明。傅斯年研究了甲骨文中“帝”出现的情况，发现其分为两类：单用之

▲ 此文原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帝”和著名号之“帝”。后者如“帝甲”、“帝甲丁”、“文武帝”等，皆殷商晚世之名（人）王。他说：^①

先王不皆号帝，号帝者不皆为先王，知禘礼独尊，帝号特异，专所以祠威显，报功烈者矣。其第一类不著名号之帝，出现最多，知此‘不冠字将军’，乃是帝之一观念之主要对象。既祈雨求年于此帝，此帝更能降饘，降若，授祐，此帝之必为上天主宰甚明，其他以帝为号者，无论其为神怪或先王，要皆为次等之帝，所谓‘在帝左右’‘配天’‘郊祀’者也。意者最初仅有此不冠字之帝，后来得配天而受禘祭者，乃冠帝字，冠帝字者既有，然后加‘上’字于不冠字之主宰帝上，而有‘上帝’一名。

即在甲骨文中，单用之“帝”字乃为上帝、天帝之名，著名号之帝皆为人王，是后起的。这真是一个清晰、明快的结论。只可惜傅氏在后文的论述中竟把“帝啻”这个名附于帝字之后，且不见于卜辞的“帝”认作商人的上帝，错把人当作了神，违背了上述规律。这皆因对“商人禘啻”的误解。

先秦文献也大致是如此。“帝、上帝”为最高天神，名、号与“帝”合称者为人世之君。而且称“×帝”者为号在前，如黄帝、炎帝、虞帝；称“帝×”者为名在后，如帝啻、帝尧、帝舜、帝甲、帝乙、帝辛。按之《诗经》、《左传》、《国语》乃至《易》的经文，都大致不差。《尚书·尧典》、《舜典》、《皋陶谟》称尧、舜为帝，但于天神则称“上帝”以区别，例如“肆类于上帝”（《舜典》）、“徯志以昭受上帝”（《皋陶谟》）。顾颉刚先生认为，“《尧典》等以‘帝’为活人的阶位之称，是一个最明显的漏洞”（《古史辨》自序），可以说明这些文章为战国时作品。但是即使是在这些文献中，人神的区别仍然是清清楚楚的。

上古“帝”的祭祀为禘。帝之礼曰帝（禘），帝（禘）时所享之神为帝。^② 甲骨文、金文中“帝”、“禘”同字。西周王室《庚姬尊》：“佳五月

①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辰在丁亥，帝（禘）司（祠）。”康王《小孟鼎》：“佳八月既望，用牲啻（禘）周王〔武〕王成王。”^①“禘”本是祭帝之礼，怎么又会跟祭祀祖先联在一起呢？古之先民认为他们的祖宗都是上帝的子孙（类似于希腊神话中宙斯与人间女子生下半神半人的英雄），因此在祭祀中总是以其人王之先祖配祀于天神之上帝。《诗经·长发》郑笺：“大禘，郊祭天也。礼记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谓也。”祭天即是祭帝，上古天、帝一也。上古之君主于冬至日于南郊祭上帝，称为郊祭、郊天，郊天即是祭帝，亦曰大禘，《说文》：“禘，谛祭也。周礼曰：五岁一禘。”

《国语·鲁语上》：“商人禘尝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尝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傅斯年主张“夷夏东西说”，以商、周不同种族。^②在这里却遇到一个坚实的反例：商周同禘帝尝。于是他解释说，这是周人“借了”商人的帝。^③其说误。其误有二：其一，帝尝并非帝；其二，周人自来有“帝”，不需向商人去“借”。夏商周秦人实同一民族，而且自尧舜以降，夏商周秦皆同祀一个共同的帝，世代相传。共同的民族而有共同的宗教和文化，在上古时期尤其如此。前一“民族”问题拟另文讨论。^④今论后一问题。以先祖配天（帝），这是上古禘礼、郊礼之制。在较早的时候，只有天子才能举行这种大礼，禘祭、郊祭之主是帝，是唯一的，而配天之先祖则可不同。“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史记·封禅书》）、“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孔子家语·礼运》）是其证。春秋时期，诸侯们为了抬高自己的地位，自行禘礼，以自己的先祖配天，孔子对此很不满。^⑤商周人同祖于高辛氏帝尝。据《史记》中《殷本纪》、《周本纪》记载，帝尝元妃姜原履迹生弃（后稷），帝尝次妃简狄吞卵生契。除去其中人为地

① 王文耀：《金文简明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399页。

② 有的学者进一步提出商人是东夷族。笔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而认为夏商周同族。

③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7页。

④ 周及徐：《戎夏同源说》，上海东亚语言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6年10月），待刊发。

⑤ 《论语·八佾》：“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